“先跑风波”中,我们该投票给谁?

【学者视线之景凯旋专栏】

在凤凰卫视的辩论节目里,范美忠与批评者郭松民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郭松民当庭谩骂范是“无耻”“杂种”,引起一些观众反感。在网易发起的这两人中你选谁做孩子老师的投票中,投范美忠的占了36%,投郭松民的只占15%,当然更多的人是两个都不选。

郭氏的失败在于他将辩论当成了批斗。在今天的社会,要指责范的言行失当,首先应当证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一致,如果一开口就说,必须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全公共利益,那就会让人生疑。因为过去的经验教训太多了,所以才有人说,只有那些牺牲的教师才有资格批评范。网上的投票说明,许多人还是看到,范美忠的言论是不妥的,尤其是他认为救人与自保的行为没有区别,但要像郭松民那样采用人身攻击,以不合道德的方式捍卫道德,同样甚至更加不适合当教师。

许多人不赞同郭松民,更是因为他对光亚学校校长的不文明态度。在对待这个事件上,范美忠所在学校校长卿光亚抱持的是一种宽容的心态。他认为,范美忠的言论是不对的,但这只能是帮助教育。在他看来,范在平时教学中是一个不错的老师,如果因为范的这次言论就开除他,那是因言治罪,他没有这个权利。据说,此事发生之后,有许多人打电话给卿校长,要求开除范美忠。他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私下对朋友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和教养的人,这样的人既能坚持公众的道德观,也能理解权利对每个公民的含义。

都江堰光亚学校是卿光亚开办的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之一,这次地震中卿和范其实都是灾民。在回答郭松民的质问时,卿光亚还说了一句,希望骂那些修楼修垮的人。宽容对待一个他认为有错的下属,同时提醒人们应当关注如何避免人为灾难,而不是一味讨论对灾难的态度,这在群情激愤中无疑是一种冷静而理智的声音。

我们崇拜英雄,呼唤道德,这都是良好的愿望,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好人去牺牲。为了避免这种牺牲,让好人一生平安,我们更应当思考整个社会组织方面的缺陷。比如说,当我同一些外国学生谈及这次地震时,他们都会提到,在他们国家制定有关防灾演习的法规,学校每年都必须组织若干次演习。在白岩松的一个电视节目里,就采访了日本学校的防震演习,可直到汶川地震发生,许多人才知道有这个节目。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却从来没有组织过这样的全社会防灾演习。如果我们平时就具有灾难意识,重视防灾教育,在灾害来临时,也许我们就可以少一些牺牲。在这次地震中,安县桑枣中学房屋没倒塌,2323名学生全部生还,北川陈家坝中学房屋虽然倒塌了,576名学生只死了11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桑枣中学、陈家坝中学在地震前都曾多次组织过应急演习,在地震发生时能迅速疏散学生。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人类美德的稀缺性和有限性是一个偶然但却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是将我们的道德法则建立于其上的一个经验性的陈述,它排除那种完全无视个人权利的道德高标,同时也视善的追求是人类共同体生存的必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网民们没有投范郭二人的票。他们会把票投给那些临危救人的教师们,更会把票投给那些具有灾难意识的校长们。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查分里的公民权利远不止免费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时代在进步,国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这从高考有偿查分的问题上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

几年前,高考有偿查分还是一个通例。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花几个“小钱”去查分,自然不值一提。但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对高考成绩本来就有着天然的知晓权,根本不需要“购买”。随着有识之士的关注并呼吁,公民的这个权利意识逐步苏醒,通过媒体等渠道向有关部门诉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已经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江西、重庆、河南等地“免费”查询,除了考试网站免费查询外,通过声讯电话快速查询则只收取市话费。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省市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收取每分钟1-2元不等的“信息费”,利用高考成绩的这个“公共信息”进行寻租,估计也挺不了多久了。

舆论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高考查分热线公益化。教育部门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天经地义有为广大考生提供周到服务的义务,包括在第一时间内为考生提供准确的高考成绩。更何况,每位考生都交纳了不菲的考试费用,这费用就应该包括高考分数发布成本。考试部门出卖这种“垄断信息”以自肥,实在有损形象。

现在看来,教育部门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收益。且不说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依然在出卖高考分数,收取不菲的信息费,就是无偿“提供信息”,也会通过“独家授权”而获得一些回报,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因此,“公益化”还没完全做到。

事实上,查分里的公民权利还远不止于此。现在,教育部门承诺高考成绩发布的无偿化,只是如果你要快速查询,那就要“付费”。但在技术手段已经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快速”就要收费,这个“时间差”与其说是技术上的问题,还不如说是观念上的问题,是懒政加寻租的结果。

高考信息关注度高,舆论压力大,于是部分地区免费了,但其他各种考试,性质不也一样吗,这些考试成绩查询的信息费同样不合理。

高考成绩对考生个人来说是公开的,对别人来说又不是公开的。对自己公开是知情权,对别人公开则是滥用知情权,侵犯隐私权,因此,即便是可以公开查询也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如何以人为本地从技术上完善细节,将好事做好,服务更加到位,也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查询虽然免费了,但考试费是否提高了,从而变相地将这部分收益从考试费里获取了呢?这更是一个问题,国家审计署就曾公告发布了考试费里的巨大黑洞。我在国家审计署的网站上,就曾看到公民的建议,要求审计署不仅要对信息费的去向进行审计,对考试费更要加强审计并公布,这些都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体现。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什么样的老师可以做有偿家教

■今日视点

北京市近日出台新的《北京市特级教师管理办法》,要求对特级教师一年进行一次审核,违规进行有偿家教等六种情况将被撤销特级教师称号,取消相关待遇,并收回特级教师证书。“特级教师应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特级教师作为师德楷模,有责任对学生和其他教师进行帮扶,所以不应该进行有偿家教。特级教师如果用课余时间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育活动,一定会牵扯精力,影响正常教学,所以新规定不允许特级教师进行有偿家教。

(6月15日《北京晚报》)

特级教师不能做有偿家教,那么,什么样的老师可以做呢?按照北京市教委出台的这个规定,似乎所有非特级教师都被允许从事有偿家教了,好像有点荒唐。这样的一个答案,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有偿家教的泛滥之势——毕竟,在任何一个城市,特级教师永远都只是教师中极小的一部分。

我并不清楚为什么北京市教委把禁止从事有偿家教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特级教师”这个群体。没关系,从北京市教委的表态,我们也可以大致揣测一下此举的理由。一:北京市教委认为对特级教师进行一年一度的审核比较便利,毕竟人数少。二:北京市教委觉得取消特级教师的称号和待遇有相当大的威慑力。三:他们认为特级教师的道德自觉性显然应该高于普通教师,更应该自觉地做拒绝有偿家教的楷模。

如果是前面两个理由,那我不得不说北京市教委是偷懒了——如果能准确掌握特级教师们有没有做有偿家教的信息,为什么不能多花点力气审核全部教师呢?对于有偿家教的监督,难就难在无法准确掌握相关信息,如果北京市教委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何不推而广之呢?此外,如果说称号和待遇对特级教师们有足够的制约作用,那么,北京市教委同样可以用类似的办法来制约普通教师。只是将特级教师纳入禁止有偿家教的行列,对北京市教委来说,实在是有点“花小成本找大面子”的意思。

如果是第三个理由,那么我只能说,北京市教委仍然太相信道德自觉的力量了。你知道,在利益面前,你永远不能寄希望于道德的力量能解决一切问题,有针对性的制度监督,永远比道德自觉要可靠得多。如果特级教师们有北京市教委所期望的道德自觉,那也就根本没必要再专门出台一个管理办法来禁止有偿家教了。

北京市教委禁止特级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初衷是好的,但已经一目了然的这些漏洞,必然将令这个看似雷厉风行的管理办法,再次成为糊在墙上的禁令。有偿家教的滋生土壤,是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或许北京市教委无力从根本上颠覆应试教育的格局,但至少,在可能的范围内推行与有偿家教格格不入的素质教育,是比禁止特级教师从事有偿家教更有意义的事。

(尹之)

震灾过后更不能麻木于矿难

■热点纵论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正在进行,国人还没有完全从悲伤中回过神来,一系列矿难却再次以悲痛之手将人们紧紧抓住。

先是6月12日22时许,湖北鹤峰土垭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造成7名探矿工人全部遇难。然后是13日,山西接连发生两起矿难事故:23时许,宁武县雨田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目前已发现7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而当天11时许发生在孝义市安信煤业公司的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27人遇难。经过初步分析,孝义安信煤业公司矿井爆炸直接原因是井下火药库储存的劣质炸药自燃后引发爆炸。接连两日,发生矿难三起,遇难者总数达到41人。

“地震高发期”的劫波尚未度尽,难道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矿难多发期?在我国已有了为地震灾害死难者设立哀悼日并降半旗的仪式之后,这些死于矿难的人是否也可以配享国哀?无论如何,一系列不约而同发生的矿难至少表明,并不是经过汶川强震之后,所有的灾难都会远离,所有的痛苦都会纾缓,所有的死难都可以变得令人麻木。

在这一系列矿难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山西。从2001年至2005年,被称为“中国煤海”的山西每年煤矿事故平均死亡4200人。而山西省近年来也一直将事故防范作为重中之重。2007年1月,时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痛心地说:“山西不能再要流血的、黑色的GDP了。”并誓言在三年内将清除、淘汰全省非法及小型煤矿,重新整治煤矿资源,使5年内百万吨死亡率低于国际标准。为此,曾不惜采用卫星定位或动用飞机进行空中侦察来锁定黑窑主。同时也展开全省地毯式搜索、清缴私藏炸药,严惩生产、运输及私藏炸药者。然而,死亡27人之多的孝义安信矿难,其肇因仍为劣质炸药自燃,以及“这个煤矿的安全管理混乱”。

在艰难地拂去地震所震出的悲伤尘埃之后,我们悲哀地发现,频繁的矿难从来没有远离我们。每一起矿难,当然不是用来否定所有“铁腕整治”的血肉证据,但必然指出其仍然欠缺与乏力之处。我们也许不可能为每一个因灾死难者降半旗,但我们需要获得足够的勇气与信心,来置身于这样一个灾难多发的时代。而事实上,除了建立严密稳固的预防体系,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将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真正免于被伤害。震灾过后,我们更不能麻木于矿难。

(杨耕身)

电邮: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

“假院士帽”为何这么多人想戴?

■公民发言

一起以“院士评选”为名行骗的案件在北京开审,被告人关制钧虚设“中国管理科学院”非法吸收“院士”,借机收取高额“评审费”。包括众多著名国企高管和高校教授在内的50余人上当受骗。

(6月15日《法制日报》)

此处所谓“上当受骗”,只能在简单意义上成立——因为这个“院士”是假的,所以交易双方就是骗子与被骗的关系;可在交易的“真实意愿表达”意义上,那些国企高管和高校教授如果在事后果真摆出一副无辜受骗的样子,则难免有些太过虚伪。“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压根就是骗钱的假玩意,见多识广如国企高管和高校教授者焉能不知道?知道是假帽子依然要买,这才更有可能是背后的真实情况。

换句话说,“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之假本身是次要的,关键是“院士”荣誉名头之响以及头顶光环增色之巨才是重要的。

如果让这些“假院士”们自己选择,他们会选择曝光事件以解受骗之恨,还是会选择捂紧盖子继续头戴院士高帽,恐怕还很难说呢。说白了,花钱买“假院士”的帽子戴,是一种“贴金型消费”。功能上,很有些类似于女子的化妆品。当然,“让自己更好看”之后完全可能衍生出更多现实的利益。正如办一张假文凭往往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

不少网友很纳闷:贩卖“假院士”的伎俩技术含量并不高,这些国企高管和教授为何如此好骗?其实,骗子们真正看重的所谓“市场”,是深知这些人对“贴金型消费”的需求有多么强烈,以及他们用公款来支付个人荣誉支出有多么方便。类似的骗术之所以连绵不绝,关键正在于此。

(舒圣祥)